



不断丰富文学中国的色彩

□梁鸿鹰

当代文学以文学之笔墨对中国实践进行书写,强化文学与国家、民族的血肉精神联系,是一个美好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中指出,“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否强健至为重要。文艺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的灵魂产生影响,文学像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照亮国家和民族前行的路途。文学形象地记录一个民族的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兴亡的文化记忆,文学无微不至地帮助人们建构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同样建构和强化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价值。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伟大复兴,“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凝聚国家意志,张扬中国精神,是当代文学的庄重选择。

好的文学给人以精神归属感、心灵向心力,让人能够从中打捞先辈的过往,找到民族的来路,更从凝聚于文字中的价值观,寻求到家国共同意志与自己之间的联系。莎士比亚说,“我怀着比对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国家利益的累积通过文学来实现,之所以往强过历史文献,在于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别要不断丰富国家历史、国家向心力、国家共同信仰的建构。

在当代文学强化国族叙事意识的过程中,既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现实很强的丰富性、差异性,也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的整体性、统一性。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明从未断绝。记录和展示民族与国家成长的足迹,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误解,艺术地告诉人们中国历史发展的真相与源流,才能讲好中华民族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中国故事。作家有责任回应消解和重构中国历史的思潮,鼓舞人们面向未来,增进民众对国家历史和传统的亲和力。

文化是精神家园,闻一多曾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先人为我们累积的文化遗产,为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依然以其瑰丽感染着后代。比如在我们已经能够飞天登月的今天,科学

文学创作要由人的个别通往一般,由人的情感与心灵达到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要把个人经验、情感、想象转化为中国经验、情感和精神,而不一定非得反映外在的、热闹的生产过程。现代性或现代化最本质地体现在人的观念、精神追求上,创作要探索社会深处律动,反映价值观新趋向,昭示生活微小变化在未来所蕴藏的意义,特别是要通过个人化的个性化经验、情感、想象表达中国经验和中国情感。

二

当今世界日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的过程为现代中国故事的书写提供了充分依据,我们应自豪地为世界提供富于当代性现代性的中国经验。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作家要注目中国发展最进步最具有超越意义的那些方面,用自己的笔,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步,改变多少年来中国给西方人留下的“古老的、陈旧的、历史沧桑的”印象,改变我们在“文化上神秘而难以接近”等印象,坚持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警觉自我的他者化,把发展中的、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奇迹展现出来。

文学的“中国”形象由一代代作家共同构建,不同时代不同的中国形象,积累和丰富着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中国形象所包含的政治和文化诉求,对国际社会逐渐认识中国产生着巨大影响。放在世界视野中观察“中国形象”,作家责任重大。在融入国际潮流中迈出新步伐,是中国经验的主流,中国改革建设在世界现代化轨道上的进步,已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要到生活最细微的地方去,倾听时代的声音,以文学之笔,书写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贡献。这才是面向现代的中国经验的主旋律。

我国不仅在经济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实现绿水青山,弘扬传统文化等方面,也有不少可喜的进展。人们对物质化、功利化普遍反感,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民族主流价值观有了越来越多的契合,人们更相信从自己的土壤里生养出来的价值,要把那些带有中国人自己体温的坚守表现出来,让精神追求、精神价值以及对生命的庄重思考,成为文学创作的价值崇尚,使自己

的作品因安妥了人们的灵魂而受到珍爱。

三

中国经验因当代中国丰富多样的现实而色彩斑斓,生活本身给文艺创作开辟的路径、可能性极为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得到表现。”要开阔中国经验的表达视野,呈现中国社会生活的多个层次与侧面,给人看到多样的、全面的中国理想、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

中国有着发展中的欣喜,同样面临发展中的忧虑。一方面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一方面是前进中的问题与矛盾,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矛盾凸显,道德价值观犹疑分化,文化上多样化的旺盛需求,在资讯、媒体高度发达,中外文化交流碰撞极为密切的当今,语言、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作家每天都在与复杂的生活相遇。中国本身的进步与落后、愚昧与昌明、科学与迷信的较量,促进作家不停顿地思考与提炼。中国有着过多的历史负担,现实生活与落后观念的纠缠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优秀的作家能够拨开迷雾,开掘生活的本质。

文学创作要由人的个别通往一般,由人的情感与心灵达到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要把个人经验、情感、想象转化为中国经验、情感和精神,而不一定非得反映外在的、热闹的生产过程。现代性或现代化最本质地体现在人的观念、精神追求上,创作要探索社会深处律动,反映价值观新趋向,昭示生活微小变化在未来所蕴藏的意义,特别是要通过个人化的个性化经验、情感、想象表达中国经验和中国情感。

这种表达殊为不易。苏联作家爱伦堡曾经讲,在苏联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上,纺织女工在发言中向作家们“讨债”,质问作家为什么没有写纺织女工的小说。此后20多年里,苏联确实也出现了不少写纺织工人的作品,但大都躺在图书馆里无人问津。工厂图书馆里被借阅最多的,还是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人们更愿意读《安娜·卡列尼娜》,是因为工厂女工“看托尔斯泰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了解那已经死亡了的社会道德,也是为了了解活生生的人类感情的复杂性。”作品写的纺织女工“不是人,而是机器;表现的不是人的感情,而仅仅是生产过程”,肯定不会受到欢迎。文学需要独特性、个别性,文学讲究复杂多义性,讲究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掘,聆听时代的声音,表现中国经验,更需要开掘人的内心。

不同文化相互回应,相互质疑,并非简单地叠加各自所得成果,而是相互比较,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交流各自的缺陷和不足。这句话也适用于“中国故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建设性竞争”的姿态。

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里,重新认识、评价中国的位置和作用?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辨识、保持、更新“中国”的主体性、丰富性和差异性?这些宏大的问题,在新世纪以来不断被重新提起,在很多时候,它们会被通俗、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故事”。就宏大的历史进程而言,“中国故事”的核心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变动中,重新燃起的重述历史的冲动和重建国族叙事的诉求。具体到学术层面便是,在一个充满普遍主义陷阱的概念、知识、理论体系中,如何为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经验和当下感受找到一个自信、充沛而且又具有辨识度的表达形式。

当“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学相遇时,便成为更加具体的提问,即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如何辨识、阐释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所谓的价值和意义绝非只是审美层面的传播和影响,而是以审美名目出现的我们的经验、情感和想象及其所包含的权利诉求如何被识别、承认和尊重。也就是说,谈论“中国故事”范畴内的中国文学时,需要正视其中所包含的与“抵抗”、“正名”相关的文化政治诉求。这个问题既涉及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其表述,又涉及当下现实情境的分析和判断。

首先,这个概念在近些年被不断提起,是有其现实依据的。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文学现象和话题总是与“中国故事”的批评话语相关联。因为,这些文学现象从内部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在外部又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分工有直接联系。其次,这个概念的起源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国故事”并非只是中国日益深陷全球化市场之后才有的文化问题。“何谓中国”、“中国去往何处”等深层焦虑一直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说,“中国故事”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国家历史进程始终紧紧捆绑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民族性焦虑在文学上投射的结果。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故事”理解为对1930年代末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历史回应。有所区别的是,彼时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本质上还只是民族主义范畴内建党、建国、执政等鲜明、直接的现代政治诉求。而如今的“中国故事”则是建立于政治、经济实力之上的、直面资本主义全球话语体系的文化诉求。

基于此,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中理解“中国故事”,未尝不可将其理解为一个庞大、复杂的叙事,同时因为语境的更迭,它会变更为不同的主题和形式。简而言之,具体地讨论“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考虑的便是“叙事”与“语境”的关系。举例而言,“进城”是1980年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话题。与这个话题的兴盛相伴的是,“文革”结束后由国家力量所主导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社会进程的重启和加速。因此,所谓“进城”其实是乡土社会对城市文明的想象所引发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农民问题放在乡土社会、乡土文学这样的历史文化视野中方能得到妥帖的解释。当有人把新世纪以来兴起的,特别是“非虚构”写作中的“返乡”话题视为乡土文学延续、新变,并冠以“新乡土”之类的说法时,辨识语境差别的重要性便显示出来。抛开如何评价当下飞速推进的城市进程和一些局部的特殊现象,我们必须意识到,依托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以城市文明为主导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理解了这个前提,便不难发现,所谓“返乡”及其与之相关的写作,其实是在城市文明的视野中重新发现了乡土。因此,“返乡”现象其实是城市文明的构成部分,而“返乡”写作则是在城市书写的延伸。更直接地说,“返乡”及其引发的讨论和命名是城市文明的精神折射,是“城市病”的一种。

辨析语境是为了清醒审视“中国故事”范畴下具体问题的症候,而对语境差别的发现和判断又与参照系的调整和设置相关,因此,边界和视野成为“中国故事”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前提。“中国故事”是自我辨识、形塑主体性的概念,这便意味着这个概念在生成时,同时包括了自我确认和争取他者认同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后者是一种“承认的政治”,它强调在他者的聆听和目光的凝视中映照出自身,从而修订前者。所以,“中国故事”若想成为阐释当代中国的有效概念,它需要在与外界的交流和竞争中来建构、调整自身的理论规划。换而言之,我们需要把“中国故事”视为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建构概念,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而非封闭、排他的霸权理论。如法国左翼思想家皮埃尔·马舍雷所提醒的那样:“只有在集合了各种文化的复杂关系体系的内部,通过维护各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才能拥有文化身份……任何文化都不会因自身或为自身而存在;文化只能在有区别的全球体系内部才能自我建构,让人认可。不同文化相互回应,相互质疑,并非简单地叠加各自所得成果,而是相互比较,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交流各自的缺陷和不足。”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中国故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建设性竞争”的姿态。

术情怀难能可贵!

了解、熟悉前人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有抱负的学术研究者,有开拓性和独创性的研究,必不能无视学术史。赵焕亭的研究,正可以为有志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青年,提供了解现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个入口,从一个维度获得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认知。

赵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选取四个向度讨论作家传记,即一、传记作者的主体性;二、传记中的传主作品呈现;三、传记中的原型考证;四、传记中童年叙事的启示价值。这是一个有新意的分类研究,而且,每一个问题之下,她都精心挑选至少四部以不同传主为对象,由著名学者撰写的传记加以研究和讨论,这样的研究和探讨,积极意义显而易见,诚如韦勒克指出:“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或许,不支持郁达夫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论调的研究,同样会觉得韦勒克的说法值得斟酌。但是,传记式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范式,不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还是会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选项。

总之,作家传记的研究尽管有别于研究作家传记文献,但都是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沃土,能够联通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两者通道之一。笔者期待赵焕亭有更多的新的发现和创见。

作家传记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读赵焕亭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随想 □巫小黎

史传文学高度发达、传统悠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前的人读书,大多从了解作者的家庭、身世和成长历程开始,此即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诠释传统。

始于认识人、理解人,进而读懂文的研究方法,其实中西方相通。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就列“文学和传记”专章讨论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称之为“传记式的文学研究”,他将作家的传记研究纳入“文学的外部研究”,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呼应,构成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韦勒克的理论是否启发、刺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实在不易并且也不必求证。但是,现代文学研究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作家传记大量出版、广为流传,确是没人能够否认的事实。赵焕亭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出版了同名专著,大体也可以成为现代作家传记写作、出版、消费蔚为风行的一个佐证。再者,“一主多传,传传不同”如今在出版界已司空见惯。根据赵焕亭教授统计,仅张爱玲传就有

30多部。笔者估测,实际情况恐怕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由此看来,现代文学作家传记的写作、出版、传播和消费,便有不容置辩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尤其是研究者/学者——而非作家、诗人所撰写的作家的学术传记,往往具有多重学术意义,首先是对作家主体即传主的个人历史文献——如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等非虚构文本的研究,其价值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那样:“传记式的框架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文学史上所有真正与发展相关的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即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成长、成熟和可能衰败的问题。”其次,“传记也为解决文学史上其他问题积累资料。”譬如,作家的个人收入、生存状况,他的亲属及朋友圈,作家的居住地及当地的风土、习俗、宗教信仰等,“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第三,一部优秀的作家的学术传记,必然也是传主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传主的文学成就、文学史上的评价及其位置等诸多

问题,优秀的传记撰写者,对此作出认真严肃的思考,是最低起点的要求,即便不能给出成体系的结论,也要做到自圆其说,而不是只八卦作家的感情经历或私人生活之类。以此观之,作家传记的研究,其本质就是研究之研究,学科史与学术史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一如业界同行耳熟能详的黄修己著《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一类。研究并撰写具有学术史性质的著述,对于研究者来说极富挑战性,要求不可谓不高,非站在学科发展的前列,高屋建瓴、总览学科概貌,全面了解学科发展动向和基本态势,不能写出值得期待的研究成果。何况,这是一项颇为宏观的研究,研究对象的不可穷尽性,势必要做出富有说服力的取舍,否则,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经不起推敲与质疑。研究者的良好的学术积累和基本素养就非常重要,换言之,非训练有素的学者不能做,须是史才、史识、史德兼而有之。

由是观之,赵焕亭的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选的实在是一条并不好走的路,学术勇气可嘉,学



□方岩
「中国故事」的语境和边界